

曹操为何一辈子打仗总要亲征？



建安二十年(215)三月,六十岁的曹操又一次翻身上马,率中军西出邳城,向汉中进发,亲征张鲁。同年八月,孙权趁曹操西征之际率众十万围攻合肥,张辽以八百死士在逍遥津杀得东吴人仰马翻……

这几乎是曹操一生的常态。从镇压黄巾到统一北方,再到晚年与孙刘周旋,他一生多次亲征,几乎每一场重要的战役,他都亲自上阵。西打汉中、东守合肥、北征乌桓、南拒孙权,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,在四方战场上不停地旋转。

有人认为,曹操一辈子在战场之间奔波是因为他生性多疑、不肯放权。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,曹操的频繁亲征,是个人能力、政治处境、军事制度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亲征是生存本能

在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中经常可以看到“公自征”“公征之”一类的表述,建安二年(197),宛城征张绣;建安三年(198),东征灭吕布;建安四年至五年(199-200),官渡之战全程亲征;建安十三年(208),南征刘表及赤壁之战;建安十七年至二十一年(212-216),四次南征孙权;建安二十年(215),西征张鲁。而在这些曹操亲自指挥的战役中,胜者是占绝对多数的。

这当然和曹操出众的个人能力有很大关系。年少时曹操就才武过人,博览群书,尤好读兵书,并对排兵布阵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,史书中载:

(曹操)博览群书,特好兵法,抄集诸家兵法,名曰接要。又注孙武十三篇,皆传于世。(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异同杂语》)

自作兵书十万余言,诸将征伐,皆以新书从事。(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)

曹操是曹魏阵营中的军事最强者,这一点毋庸置疑,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。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对于曹操给出了极高的评价:

“擘申、商之法术,该韩、白之奇策,官方授材,各因其器,矫情任算,不念旧恶,终能总御皇机,克成洪业者,惟其明略最优。”

陈寿认为曹操称得上“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”。裴松之注引的《魏书》更是将其和孙子、吴起相比:

“其行军用师,大较依孙、吴之法,而因事设奇,谲敌制胜,变化如神。”

连曹操的对手诸葛亮也称赞曹操的计谋:“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。”(《后出师表》)后世的苏轼也称:“臣窃观自古用兵者,莫如曹操。”(《代滕甫论西夏书》)

史书中描写曹操临阵时的神态:“与虏对阵,意思安闲,如不欲战,然及至决机乘胜,气势盈溢。”战前从容镇定,战时雷霆万钧,正是顶尖军事统帅才有的心理素质。也正是这种超群的才能造就了他的不可替代性,而曹操本人对自己的军事能力也有着清晰的认知,并且非常自信,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:“设使国家无有孤,不知当

几人称帝,几人称王。”

正因为他精通兵法、战功卓著,他才自信能亲自掌控战局。换成任何一个部下统兵,曹操未必放心,他清楚自己与他人能力的差别,这种“非我不可”的自信,正是他频繁亲征的重要心理驱动力。

除了曹操的个人能力和性格,东汉末年复杂的政治环境也使曹操不得不选择亲征。东汉末年,朝廷权威崩溃,诸侯割据。曹操的地盘,西起关中,东至徐州,北抵塞外,南达荆襄,但仅仅靠着被迎到许昌的汉献帝是不能维护好自己的势力范围的。曹操虽然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,但天子在手,不等于权力在握。

天下人承认曹操的地位,不是因为他挂着“丞相”的头衔,而是因为他手里握着全国最强大的军队。一旦中军旁落,他的权臣地位将瞬间被架空,汉献帝会立刻翻脸,朝中反对派会蜂拥而起,各地的潜在对手会趁火打劫。而曹操晚年面临的对手也不是等闲之辈,刘备取益州、孙权据江东,都是当世枭雄。曹魏将领中,夏侯渊在定军山兵败身死,曹仁在樊城被关羽围困,几乎不支,这些关键战役的失败迫使曹操不得不频繁“救火”,这种解围式的亲征,都是政治形势倒逼的结果。

东汉都督制度的缺失

东汉本无常设的都督制。所谓“都督”,在东汉末年只是一种临时差遣,朝廷临时任命某官员督某州军事,任务完成即撤,没有固定的辖区和常设的机构。都督制起源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。因为征伐四方,乃于出征时暂时设置“督军都御史”,简称督军、都督,以监督诸军。东汉以来有御史监军制度,曾或称都督,但却是监督之职,二者名同而实异。东汉顺帝时,御史中丞冯緄持节督扬、徐二州兵镇压九江“盗贼”,就是一例。此后,又以中郎将督军,更增加了军事统帅的因素。“都督”一名在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,但有的是偏裨将校,有的则是一军元帅或一个军区的主将。

汉末董卓之乱后,州郡拥兵割据称雄,朝廷为了笼络他们,颁发以将军兼督数州或都督某州的称号。献帝建安二年(197)以袁绍为

大将军,赐弓矢节钺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,是最早见于史籍的持节都督。大约同时,曹操以程昱为中郎将,领济阴太守,都督兖州事。这种都督就成为统治地方的军政长官了。

曹魏都督制是在建安年间的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的。曹操权置都督诸军事,以统领、指挥原来互不相属的多支军队,但在曹操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,都督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。在曹操生前,他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长期信任、独立镇守一方的大将体系,不是他不想设,是制度还没形成。东汉都督制度的缺失,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:曹操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前线指挥权下放给可靠的大将。他只能亲自带着中军,哪里吃紧去哪里。

一旦曹操放权于将帅,宗室与外姓将领的派系矛盾恐怕会延误战事。曹操用人的逻辑非常清晰:宗亲领军做主将,外姓将领为副将。这种安排保证了军队的忠诚,但也埋下了隐患,宗室与外姓之间、不同派系的降将之间,矛盾从未消失。为了避免因内斗出现的战争失误,曹操亲征仍旧是最稳妥的办法。

三国群雄的困局

曹操如此,其他三国君主又何尝不是? 孙权、曹丕、曹叡,无不奔波在亲征路上。如果说曹操亲征是因为能打、需要打,那么孙权的亲征就颇有些耐人寻味了。孙权的军事能力,在三国时代不是最弱的,但亲征指挥与野战进攻能力显著弱于曹操、刘备及孙策。从建安十三年(208)至青龙二年(234),孙权五次亲征合肥,但一次都没有攻克。建安二十年(215)八月,孙权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,却被张辽以八百死士杀得溃不成军,甚至本人差点被俘。

那孙权为什么非要自己上?

这其实和江东特殊的部曲制有关系。孙吴政权内部,士兵是将领的部曲、私产。将领有多少话语权,和自己有多少士兵直接相关。孙权虽然是名义上的君主,但实际上只是大家名义上的统帅。周瑜、鲁肃、程普、吕蒙等将领各有各的部曲,各有各的盘算。如果孙权派周瑜或者吕蒙去打合肥,会出现什

么情况? 第一,淮泗将领一旦在合肥站稳脚跟,会不会拥兵自重、脱离孙权的控制? 第二,江东本地世家凭什么出钱出粮为淮泗将领打仗? 第三,如果某位将领在合肥之战中势力坐大,孙权还能不能压得住他?

所以在这个时期,孙权只能自己来。自己挂帅,意味着所有的战功都归于君主,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君主手中,军权不会旁落。

曹操的儿子曹丕、孙子曹叡,同样走上了亲征的老路。曹丕在黄初五年(224)、黄初六年(225)两次亲征东吴,曹叡在太和二年(228)亲临长安督战。但和曹操亲征的本质不同,他们不像曹操那样从零开始建立军队,他们是继承了先辈的军队。而继承来的权力,永远不如自己亲手建立的稳固。所以他们需要不断地出现在军队面前,不断地用亲征来拉拢人心,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支军队。

但在三国时代的后期,蜀国却出现了例外。刘备同样是一个靠亲征立身的君主,取益州、取汉中都是由他亲征,直至章武元年(221)的夷陵之战,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,结果陆逊火烧连营,蜀军大败,刘备次年四月郁郁而终。临终前刘备对诸葛亮说:

“君才十倍曹丕,必能安国,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,辅之;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”(《三国志》)

这是一份几乎无条件的授权,刘备将年仅十七岁的刘禅和整个蜀汉政权,交给了诸葛亮,自此之后“政事无巨细,咸决于亮”,刘禅虽是皇帝,但所有政务都由诸葛亮决定,而诸葛亮又是一个绝无仅有的、绝对忠诚的能臣。

在这个层面上,刘禅作为蜀国君主就完全没有了亲征的必要。

第一,在这种权力格局下,刘禅虽然名义上是皇帝,但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“被保护”或者“被架空”的状态。

第二,刘禅本身的性格和能力也决定了他无法亲自率领军队。

诸葛亮的威望足以震慑群臣,所以蜀汉内部没有出现异心。换一个稍微有点雄心的皇帝,君臣之间早就生出嫌隙了。

建安二十五年(220)正月庚子,六十六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。这个一辈子奔波在路上的老人,终于在生命的终点停下了脚步。回顾曹操的一生,频繁亲征绝非“好战”二字可以概括,他亲征,是因为他确实能打,也因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不得不亲征。

三国群雄几乎都需要依靠亲征来维持自己的权力,万事纷杂、群雄逐鹿的年代,只有手握军权,才能获得实打实的权力。

赤帛生
来源: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郝寿臣

以戏抗日

1931年秋,东北沦陷。一次宴会上,京剧花脸名家郝寿臣提出想排演《荆轲传》,借战国义士刺秦的故事唤醒国人。南开校长张伯苓当即赞成:“这出戏在唤起民众、反抗侵略方面,很有现实意义。”校董严慈沦献策,说他手中有梁启超所写的《易水歌》。郝寿臣一听,连说“好极了”。

郝寿臣又与编剧吴幻荪精读《史记》,反复琢磨荆轲形象的塑造。在脸谱上,他借鉴梆子名家“老狮子黑”的画法,将主色黑色改为油紫色,渲染荆轲的忠勇胆识。排演期间,有人劝他别惹麻烦,郝寿臣只回了一句:“戏台上唱忠义,台下不能装糊涂。”

《荆轲传》迅速排成。此后几年,郝寿臣频繁演出此剧。每到“易水钱行”一场,他声情并茂地唱起梁启超的《易水歌》——“等闲谈笑见心肝,壮别宁为儿女颜。地老天荒孤剑在,风萧萧兮易水寒。”凄凉悲壮,台下观众触景生情,潸然泪下。1936年,百代公司为他灌制了唱片。

1934年,郝寿臣应天津春和戏院邀请,以花脸挑班连唱三天《荆轲传》等戏。11月12日,离津返京时在火车站遭人纠缠讹诈。这是一起由天津青帮安排的“做伤讹诈”案。官司打到河北省法院,最终经杨小楼疏通,以1000元了结。郝寿臣事后猜测,此事或与拒绝演夜场戏、影响戏班收入有关。他对弟子说:“我郝寿臣一不吸鸦片,二不做坏事,走的是正路,有什么可怕的!”

七七事变后,郝寿臣与马连良排演《串龙珠》。1938年4月23日,该剧首演于新新戏院夜场。只演了一场,就被汉奸告发“有抗日思想”而遭禁演。同年,郝寿臣愤然退出舞台,坚决抵抗日本军国主义。

郝寿臣手无寸铁,以戏为枪,在民族危亡之际唱出了最悲壮的呐喊。 周星